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

“双泛”研究译丛

（第一辑）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
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九九一年七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

“双泛”研究译丛

(第一辑)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
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九九一年七月

“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

“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16号)

新疆社会科学院微机排版

新疆地矿局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300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出版许可证第[752]号 定价 每本收费 10 元

前 言

《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简称“双泛”研究)是在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反分裂、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形势下,经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批准开展研究的课题。此课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自治区科委的资助。《双泛研究译丛》是这个课题子课题《对国外鼓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东突厥斯坦思想的报刊、书籍的翻译和研究》的直接成果。这套译丛共分三集:第一集主要介绍西方学术界,兼及苏联对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的著述;第二、第三集将侧重介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概况,它们的由来和发展以及一些主要的“理论”著作,汇编近期国外期刊上发表的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东突厥斯坦的文章。目的是为“双泛”研究课题提供比较广泛的背景材料,使读者能够通过广角的镜头去寻觅和研究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形成的历史和发展的轨迹。同时,通过这些译文也使我们可以了解国外学者对新疆一些比较敏感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本集主要编入两部英文专著的部分章节。(1)A. D. W. 福布斯著《新疆军阀与穆斯林:民国新疆政治史》(1986年,英国剑桥大学版)论述了1919年——1949年的新疆历史。全书包括导言、正文七章、结束语、五个附录、注释、转写表、参考文献目录、索引约合汉文35万字。录入本译丛文集的是其中的正文1——7章的20万字。(2)D. H. 麦克米伦著《中共在新疆的政策》(1979年,波尔特版)则从1949年新疆解放讲到1977年。全书分为“位置、环境、历史回顾”;“新疆领导的变更:1949——1966”;“新疆的政策模式:1949——1966”;“新疆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9”;“王恩茂以后新疆的政权与政策”等5部分共20章,书后附有注释、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本译文集所收部分为原书第二部分的第三章、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的最后一章——结语。有关“文化革命”的第四、五部分原始资料多为各种红卫兵小报和取自台湾的传闻,连作者也认为史料靠不大住,所以未予收录。这两部著作的主要章节串起来,所叙述新疆历史的跨度是47年,即1919——1966年,正好使读者看到在西方作者笔下,近50年的新疆历史究竟被描述成什么样子!

这两部英文著作的共同特点:第一,比较新,是近年来的出版物,大体上可以代表西方目前的研究水平,特别是《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更是西方研究现代新疆仅有

的一部专著；第二，综合性较强。它们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所发展，不但反映了作者的独特见解，而且还反映了其他许多西方作者的观点；第三，资料比较丰富。《新疆军阀与穆斯林》引述文献 300 余种，特别广泛引用了英国前印度事务部大量鲜为人知的外交档案材料。

另外，本译文集还编入一部俄文专著，即库特鲁科夫撰写的《1944——1949 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1954 年，莫斯科版）。目的是请读者在看了西方学者有关新疆“三区革命”的论述后，再看一下当年苏联学者的说法，以便比较、鉴别、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译文集收编的基本上是些学术著作，作者也都是学术界人士。福布斯是研究中国西北穆斯林问题的专家，曾发表过《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突厥斯坦阿古柏伊斯兰政权：1866——1877》、《文献研究：中国和新疆穆斯林并古代中国与伊斯兰的贸易往来》、《民国时期（1911——1949）中国西北穆斯林分离主义》等论文，现在英国阿伯丁大学任教。麦克米伦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纳森）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院讲师，曾获格罗里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一度在台北马里兰大学远东部任教。库特鲁科夫于 1944——1946 年参与新疆的三区革命，1946——1947 年任新疆喀什国民教育视察员，1952 年毕业于苏联塔什干大学东方系，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58 年起为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这几人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政治联系，但正如人们经常见到的那样，面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历史，不同的人，从各自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出发，却可能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我国各族学者根据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早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论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却常常带着历史的偏见，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新疆的历史，离间祖国与新疆的血肉关系。写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一书扉页上的内容简介就是一份绝妙的“自白”。福布斯毫不掩饰地声称：“写作本书是为了分析新疆内部的军阀与伊斯兰政治，同时也考虑到‘列强’在该地区利益。在那个时期中，该地区实质是中国在亚洲内陆的一块殖民地。本书不仅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关，而且涉及中亚伊斯兰政治的复活，涉及苏联沿着沙皇老路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涉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政治追求的理解。它提醒人们尽管世界上到处谈论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但这两种东西不管过去或者现在，从来都不是欧洲的专利。”（着重号为编者所加）尽管这位西方人士不是一个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分子，但他确实是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裂新疆的活动提供了精神武器。“新疆殖民地论”等等，正是支撑泛突厥主义和东突厥斯坦思想的基本理论之一。

由于译丛原作者的政治偏见，加上史料不尽准确，此文集仅在内部刊行，供新疆地、师级以上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请勿公开引用。

参与本集翻译的有王嘉琳、胡锦涛、李琪、何马同志，主编由杨发仁同志担任，

执行编辑为何培新同志。

云 帆

1991, 6.

目 录

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9——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	(1)
一 1911——1928年的新疆:杨增新政府	(1)
二 1928——1931年的新疆:哈密暴动和 马仲英初次入新	(15)
三 1931——1933年的新疆:南疆突厥穆斯林暴动	(29)
四 1933——1934年的新疆:东干入新、突厥独立 和苏联干涉	(48)
五 1934——1944年的新疆:盛世才统治下的穆斯林	(67)
六 1944——1946年的新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穆斯林 “分离主义”	(88)
七 1946——1949年的新疆:共产党接管前夕的 穆斯林	(111)
八 结束语	(130)
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运动 的组成部分	(135)
一 1944年民族解放运动前夜新疆省的形势	(135)
二 伊宁十一月起义的过程及发展	(140)
三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政策: 三区革命的民主改革	(144)
四 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谈判过程 及1946年6月6日协议的签定	(148)
五 新疆省联合政府的活动以及美帝国主义伙同国民党 反动派破坏1946年6月6日协议的阴谋	(149)
六 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的成立及其活动	(153)

七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与新疆的和平解放	(156)
八	1944—1949 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动力及其在 中国人民共同解放斗争中的地位	(157)
中共在新疆的政策		(161)
一	1966 年前中共在新疆	(161)
二	建党和干部政策	(167)
三	军事政策	(176)
四	少数民族政策	(183)
五	新疆的农业政策	(192)
六	新疆牧业政策	(202)
七	新疆工商业政策	(208)
八	结束语	(217)

新疆军阀与穆斯林

(1911——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

[英]A. D. W. 福布斯著 王嘉琳 胡锦洲译

一 1911——1928 年的新疆：杨增新政府

杨增新上台

民国第一位新疆省长杨增新，1867 年出生于云南东南部的蒙自，受中国旧式教育，1899 年中进士，同年成为清朝的文官。

18 年间，杨增新在清政府中历任西北甘、宁两省的县长、道台等职，以长于“治理”当地东干穆斯林而著称。1908 年杨增新转调新疆，任阿克苏道台，因长期在甘肃东干地区从政而受到清朝末任新疆巡抚袁大化赏识，很快被提升到首府乌鲁木齐任镇迪道，旋任提法使。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杨增新正在提法使任上。

1911 年革命迅速波及到遥远的新疆。12 月间，在背弃政府、加入哥老会的汉族官员领导下，伊犁、乌鲁木齐爆发了反清起义。乌鲁木齐起义很快遭到镇压，领导人被斩首或拷打致死，许多追随者被发往南疆充军，结果使南疆成为哥老会活动的温床。然而，伊犁的起义者却夺权成功，成立了以杨缵绪为首的政府，与乌鲁木齐分庭抗礼。

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身陷困境。他虽然镇压了乌鲁木齐起义，并有“提法使”杨增新的支持（杨手下两千名甘肃东干兵是当时新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形势已

日趋明朗，革命正在中国内地节节获胜。事态急剧演变，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以小皇帝宣统的名义签署了逊位诏书，清朝268年的统治寿终正寝；3月10日，根据与孙中山达成的协议，袁世凯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袁大化的处境越来越糟。他把权力移交给杨增新，自己逃离了乌鲁木齐。杨增新立即宣布效忠中华民国，得到的报答是袁世凯于5月间承认了他的实际地位，任命他作新疆都督和布政使，并兼管伊犁将军的事务（该地当时仍在杨缵绪的控制之下）。以后的3年里，由于内有伊犁政府、哥老会的威胁，外有蒙古侵扰新疆的东北部，杨增新不得不全力以赴去巩固自己的地位。

北京授予杨增新的权力，两千名东干士兵的力量，已足以使伊犁政府坐到谈判桌前。1912年6月，双方在塔城签约。起义者承认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同意伊犁地区归并入新疆省。杨增新准确地看出，伊犁政府的名义首脑杨缵绪旅长不过是个傀儡，于是把他调到喀什去当提督，而杨缵绪的两个革命伙伴却被视为特别危险的人物，都被派到省政府做官，抵达乌鲁木齐不久就遭逮捕并以谋反罪处决。

接着，杨增新转手对付哥老会。这项行动主要是在治安非常混乱的南疆地区。袁大化当政末年，哥老会众曾在那里戕杀清朝喀什道台夫妇及喀什、库车、墨玉的县官。由于兵不血刃地制服了伊犁政府，杨增新的政治威望大大提高。他对哥老会表面上采取招抚方针，即赦免那些最著名的领导人并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哥老会领袖们要么同意迁移，要么就得面对杨增新那些“毫无纪律、愚昧、凶残”，但无可否认是很得力的东干士兵，于是只得屈服。根据杨增新的命令，这些人后来都被秘密处决了。消灭哥老会领袖后，杨增新进一步加强对南疆的控制，把自己亲信的回族军官、云南同乡马绍武提升为库车知事。

一旦巩固了他在南疆的地位，杨增新就立即着手解决东北边境上的问题。效忠于刚刚独立的外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蒙古军队，正在那里威胁着要进军阿勒泰地区。1912年8月，蒙军攻陷当时中国管辖之下的科布多城。他们洗劫中国人的店铺，还举行了野蛮的祭典，把中国俘虏的心脏活活剜出，鲜血涂抹在胜利者的战旗上。杨增新的对策是加强东北一线从哈密直到塔城间各地的驻军，同时乘机加紧对伊犁河谷和南疆其他战略要地的军事控制，从而直接掌握了整个新疆。

杨增新并不打算长期与蒙古人作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新疆境内的蒙古居民是否可靠。因此，他宁愿与蒙军达成临时协定（通过驻乌鲁木齐俄国领事馆），其他则留待国际上解决蒙古问题时再说。新疆东北边境的危机直到1913年11月5日中俄联合声明正式发表才告解除。在这个声明中，中华民国实际上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状态。1914年3月，新、蒙双方从阿勒泰边境撤军。大约与此同时，杨增新费时3年也终于消灭了新疆哥老会的残余势力。

杨增新执政

杨增新现已成为中国最大一个省分无可争议的主宰者，能够致力于创建“桃源胜境”了。他对清代的基本行政体制未做什么改变，只是取消了从前与甘肃的那种关系，把伊犁、阿勒泰纳入新疆，从而在原有的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塔城四道外，又添设了两道，县治由 40 个增加到 47 个。前清县级以下的地方“伯克”制度也照样保留下来。

在长期统治生涯中，杨增新总是担心有人叛乱，终日惶惶不安。他不信任下级，也不信任人多势众的穆斯林属民。为了减缓恐惧，杨增新身边配置了由亲属和云南同乡组成的卫队。他还颁布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酷的法令，意图隔绝、分裂新疆人民，强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之中。他的统治活象专制君主，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照杨增新时期几次游历新疆的斯文·赫定的说法，世上再没有比这个人更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了。1922 年 7 月至 1924 年 9 月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斯克林曾向新德里的上司报告说，杨增新乃是凭借下列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 1, 实行直接负责制，甚至南疆最偏远的县长都直接向他本人负责，以致所有道尹形同虚设；

- 2, 向全疆各地派驻“委员”，密切监督所有官员的活动；

- 3, 逐步以亲属、同乡替换北京任命的官员；

- 4, 亲自严格检查信件，即使高级官员的信件也不例外，同时禁止所有报纸和谈论当前形势的印刷品流入新疆。

对于属下官员，杨增新也是极力保密。他开设有电报，但据说总是亲自掌管乌鲁木齐电报房的钥匙，每早开门，晚间上锁，“有用的电报自己保管，不利的就索性销毁。他亲自精心掌管机要，甚至最亲近的部下也很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一旦发现或仅仅是怀疑部下有背叛行为，杨增新总是非常冷酷无情。1916 年 1 月云南爆发讨袁行动时，一些云南同乡想劝说杨增新参加，但他置若罔闻。几天后，有人密报几个云南老乡仍在策划把新疆拖入反袁斗争，杨增新立即处决了告密者，“以示信任，免生戒虑”。关于这些密谋者后来的命运，某个目击者对吴蔼宸的叙述值得全文转引。这段话不仅揭示了杨增新与其属下的关系，而且是我们所知悉的若干类似事件的叙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这段话原文如下：

元宵节，督军邀约众官员宴会。座中主客为北京教育部的视察员，在座还有新疆财政厅厅长……已近 80 高龄，一切如常，宾客皆不疑有他。

酒过数巡，督军突离席而去，但众人皆知杨不善饮，不足为怪。杨须臾复入，随一卫兵，背手持锋利大刀。督军至一主谋名夏鼎者背后，操滇音厉声曰：“杀夏鼎！”

卫兵应声挥刀，夏首已落，血溅他人衣，众皆股栗，无敢擅动。督军颜色如常，抚慰众宾：“不干大家事，请照样喝酒。”杯刚斟满，杨复外出，旋即又引卫兵入，至李寅椅后，众人惊魂甫定，又闻杀人令……满座大乱，血流遍地。北京视察员目瞪口呆，惊恐无言，老财政厅长……几瘫于椅上。至滇籍众官，皆呆若木鸡，惴惴于不知何时恶运临头。夏鼎、李寅皆为杨所深信者，私交甚笃。他们被杀，谁人还能幸免？所幸杀戮既止，督军复归原座，吩咐上酒，且历陈二人罪状，语至安祥。事毕，杨俯身用菜，照例进米饭二碗，大出众人意外。

与夏、李二人的命运相反，那些忠心耿耿者前途都没有受到影响。杨增新正是要借助这类古老的手段（“赏必厚，罚必严”）来确保属下的忠贞不贰。

对于占新疆人口 90% 以上的少数民族，杨增新的政策主要坚持两条原则，即扩大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杜绝以俄国为主的外来影响。针对当时外蒙古的独立，杨增新有意识地改变了清朝的政策，把准噶尔地区哈萨克的地位抬高到当地蒙古人之上。同样，杨增新又极力分化定居于南疆绿洲的维吾尔人和准噶尔、天山地区的草原牧民。这种手段屡试不爽，前任清朝官员曾熟谙此术，杨增新执政初年对付哈密事件、1918 年对付库车事件等地方性骚乱时，使出这种手段也很灵验。然而，新疆汉族政府的统治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当时的新疆和中亚地区一样，各突厥语民族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认同意识正在日益觉醒。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或许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穆斯林民族曾普遍同情于奥斯曼的事业，20 年代中又普遍同情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游击队（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中亚地区出现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武装——译者）。

杨增新一直认为，对于他的政权能否存在，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西境沙俄（后为苏联）的中亚地区。19 世纪中，新疆各穆斯林民族曾向往着从中亚布哈拉、浩罕汗国汲取宗教的以及经常还有政治的精神营养。阿古柏汗国覆灭后，正是这个因素促使左宗棠下令处决所有在南疆被俘的浩罕人。19 世纪下半叶时，俄国征服西突厥斯坦之后，沙皇当局曾全力制服中亚这些新臣民，从而暂时缓解了浩罕对新疆当局的政治压力。若换了杨增新，当时也会采取沙俄的那种政策：

俄国人……目标在于……使这个地区与所有外界影响隔绝，把它维持在停滞的中世纪状态中，从而排除任何自觉的、有组织的民族反抗。俄国执政者的宗教和教育政策是保存旧式的伊斯兰宗教和伊斯兰文化……赞助、保护那些最保守的经文学校，不让它们受到现代派的影响。

为了把泛突厥主义和其他“危险思想”逐出中亚属地，俄国人作了艰苦的努力，却只是延缓而未能阻止这类思想的传播。事实上，当俄国征服者初次进入内亚的绿洲和荒漠之际，正是他们自己亲手播下了现代突厥民族主义的种籽。这些基督教“异教徒”的出现，促使被征服汗国的穆斯林居民团结起来。在西突厥斯坦，俄国移民和政治流犯的到来，促进了乌孜别克、塔吉克、上库曼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哈萨克

草原，沙皇存心切断伊斯兰化程度较浅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与南方那些定居的、较正统的伊斯兰兄弟的联系，却适得其反地大大推动了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平等思想的流传。19世纪90年代中，扎吉德运动等改良主义团体对俄国中亚地区穆斯林的影响日益增长。鞑靼学者伊斯马伊尔·拜·伽斯普林斯基领导了一系列宗教、文化、教育的改革，意图重新解释伊斯兰教法，以适应当代社会条件并最终联合中亚各突厥语穆斯林民族，对抗俄国的统治。

到20世纪初，由于俄罗斯帝国内上述事态的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和关于共同的泛突厥政治命运的思想开始向外扩展到邻近的奥斯曼土耳其、卡扎尔伊朗、萨多查依阿富汗乃至清代中国的突厥语地区。1904年鞑靼兴起伊斯拉赫运动，由此涌现了第一批真正的穆斯林共产党人。1909年西突厥斯坦产生了一个名叫“青年布哈拉人”的秘密革命组织，在政治上为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的胜利所激励。1912年，哈萨克草原上一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发起了阿拉什鞑耳朵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期间，扎吉德运动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左倾，至1916年已有5000多个扎吉德学校分布于整个俄罗斯帝国。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扎吉德运动在俄属中亚突厥民族主义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代表着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既反对俄国人，又反对反动的穆斯林宗教界。”

民国新疆督军杨增新决心不让他的领地受到俄国平等、改革思想的影响。对于俄国人的图谋，他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1912年哥老会骚乱时，俄国曾派哥萨克军队去喀什保护自己的利益，杨增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劝走。4年后，沙皇在俄属中亚穆斯林中大肆征兵，造成大批哈萨克越境到新疆避难，又曾使杨增新面临一场重大危机。

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杨增新更是忧惧倍增。他从来不喜欢外国人，并且决心尽可能地不让新疆受到他们的影响。然而该地区政治实力的现实又要求他必须在俄、英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对于在俄国内战中得胜的红党，杨增新只能采取表面敷衍的政策，但却警告他的穆斯林属民说：“千万别与根本不信宗教的人来往，他们会伤害你们，迷惑你们的女人。”

对于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在新疆穆斯林中扩展政治影响的活动，杨增新的忧虑确实很有道理。早在1909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乔治·马卡特尼爵士）就曾警告中国人要“注意”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中正在觉醒的泛伊斯兰势力。这种警告有一部分肯定是基于他对胡赛音·拜·巴合察的了解。此人是阿图什的百万富商，“通晓多种文字”，曾遍游欧洲。胡赛音大力鼓吹加强新疆穆斯林与中东穆斯林的联系，曾资助阿图什的慈善组织（阿拉伯语称 waqf），修建学校、图书馆，为穆斯林男女孩童提供教育。他还出钱送一些操突厥语的有为青年去国外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曾推动新疆一些出于类似思潮的活动，如1915年有个叫阿赫迈得·凯末尔的奥斯曼臣民在喀什开办了一所学校，教导当地

穆斯林儿童把奥斯曼哈里发当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杨增新起初封闭了这所学校并监禁了所有有关人员,后来虽允许开办,却不得有任何效忠土耳其的表现,而且必须开设汉语和军训课程。奥斯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及俄国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后,来自土耳其的明显威胁逐渐消失,但另一种日益加强的危险又取而代之,这就是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在持续、迅速地增大。

还在苏联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就已在新疆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1920年白俄将军阿连阔夫逃过中、俄边界来到准噶尔时,杨增新政府曾在一份非正式协议上签字,使苏联当局得以向伊宁派驻官方代表并得到在塔城和富饶的伊犁河谷地的贸易特权。根据协议,苏联在伊宁办了个图书馆。一份当时的英国外交材料说:

这个图书馆很快就成为伊犁青年晚间聚会的场所,好几百个中国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团体;哈萨克、卡尔梅克和塔兰奇部族领袖得到了津贴;包括许多妇女在内的特务被派到各地去宣讲共产主义的福音、国内解放和新的伊斯兰教。

杨增新不能容忍这些活动,即使与强大的苏维埃邻邦对抗也在所不惜。他查封了图书馆,并企图限制去苏联的人数,但是收效不大。尤其在西北疆,苏联的影响更是不断扩展。20年代中期访问过南疆的英国领事馆官员R.O.温盖特记述道:

甚至在遥远的喀什都有些富人经常来往于俄属突厥斯坦,有些人的生意甚至做到了莫斯科。他们的儿子即使在老家上学,最后还是要去学俄语,因此与塔什干流传的那种布尔什维克思想颇有接触。与16世纪的欧洲商人家族一样,他们也最先受到新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率先挺身而出批评毛拉们保守陈腐的观念。

不仅富家子弟接触到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东突厥斯坦许多先进青年也为其所吸引……喀什或伊犁一个有志青年来到俄国当临时工,立即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块地方,那里的妇女不戴面纱,有铁路、汽车、电影院以及他认为是现代文明精华的种种事物。

英国人也象杨增新那样,对苏联的影响在新疆及其周围增强而感到担忧。20年代中期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克林向新德里报告说:

主要在伊犁,同时也在南疆地区,苏联政府正通过险恶的宣传来竭力唤起穆斯林居民的民族、阶级意识。中国的政策就是防止这种觉醒。

杨增新变本加厉地强化对内的监视,查禁一切突厥语出版物。全疆饭店里到处贴着“莫谈国是”的标语。斯克林对这些办法虽有点担心,但显然感到它们作为应急措施不仅必要,甚至还是应当的。他指出:

借助邮检制度……和其他手段,不仅所有谈及当前事件的书信、印刷品无法进入新疆,而且还有效地禁止了书面“新闻”在居民中流传。官方对教育的态度也体现着同样的政策:除了只由毛拉教授读、写古兰经的清真寺学校外,不得开办任何学校,甚至某些个人,如俄国流亡者之类,想凭教外语谋生也是不受欢迎的。从理性的角度看,这种停滞现象应当受到谴责。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使一批几乎完全从事

农业的居民平静而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统治之下。倘若在中国突厥斯坦也和在比较开放的国家一样，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至高至善的话，这样做就更有道理可言了。

然而，1925——1926 年间与勒里希考察队一起行经新疆的 N. 勒里希却把这种安宁、平静形容为“死亡般的沉寂”。

南疆的形势

民国初年，新疆政府在天山以南地区最有权势的代表是喀什提台，而且一般说来他也是新疆的第二号实力人物。由于与乌鲁木齐隔着崇山荒漠，交通不便，这位官员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完全能够把新疆西南部变成私人领地。前已述及，早在 1912——1914 年镇压哥老会时，杨增新就已开始控制南疆（中国人称之为南路）。1913 年 1 月，伊犁革命的名义领袖杨缵绪被杨增新调到喀什。他率领 400 名新军前去就任提台，不久就篡夺了道台的权力，成为喀什最高长官。战胜南疆哥老会后，杨增新任命云南同乡、回族穆斯林马绍武任库车知事。这一行动虽然大为增强了他对南疆的控制，但南路的主要绿洲喀什及更远的莎车、和田绿洲却还是鞭长莫及。杨增新显然不会把杨缵绪当成盟友，因为此人曾与伊犁革命者合作而不可信任，让他当喀什提台不过是要把他和伊犁那些支持他的人分开罢了。因此，杨增新不仅不帮助杨缵绪加强在喀什的地位，反而于 1914 年 8 月此人因军队骚乱而被迫辞职时，乘机委派了另一位云南穆斯林马福兴去接任喀什提台。

马福兴背景不详，何时来新疆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可能是杨增新部下回队（其中云南人不多，绝大多数都是甘肃人）中的一员。1911 年辛亥革命时，杨增新领导下的乌鲁木齐清朝当局征募东干新兵，马福兴被任命为其头目。1911 年——1915 年间，他一直在乌鲁木齐地区“射杀汉族煽动者和地痞流氓”。很难说杨增新把马福兴派到喀什到底是出于信任，还是为了把他打发得远一点儿。但无论如何，这一任命对于南疆的汉族和穆斯林人民却是一大灾难。

1915 年 12 月，马福兴，或当时各种资料通常所谓的马提台，带着 300 名东干新兵到达喀什，下榻于古老回城南面约 2 英里半处的汉城。这位新提台已年届 64 岁，目不识丁，但性格强悍，决心要尽快地凌驾于道尹之上。到达喀什的第二天，马福兴就不顾道尹的反对，下令逮捕处决了三个据斯科林说“看来完全无辜的人”，从此开始了他在南疆长达 8 年半的独裁统治。1916 年 3 月 8 日，乌鲁木齐政府撤换了已被狡猾的马福兴完全挫败的道尹。新任道尹——杨增新的兄弟、一个消瘦的大烟鬼于 9 月中旬抵达喀什。新道尹从未在下午两点钟以前露过面，绝大部分政务都委托给了喀什的马县长、杨增新手下的另一个东干人。杨增新这个衰弱不堪的兄弟

当上道尹，进一步加强了马福兴的地位，以致马继业于1916年6月中旬向伦敦报告说：“目前，督军（杨增新）和提台拥有异乎寻常的权力……不论政治信仰如何，任何人只要给他们捣乱，就会被捕并立即枪决。”接着，他又颇具先见之明地说：“我怀疑中国有什么力量，即使是北京的力量能够搬开他们，除非是借助谋杀之剑。”

马继业认为，马福兴完全明白自己已经爬到了顶点，现在一心只想保住这个位置并中饱私囊，因此一经巩固了他在喀什的地位，就立即着手掠夺这片新领地的人力和矿产资源。继马继业之后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斯克林正赶上马福兴大权独揽的鼎盛时期，曾详细地叙述了与提台的一次官方宴会。这位提台名义上是个穆斯林，其实是个不堪救药的酒鬼。在记述喀什汉城衙门中的这次宴会时，斯克林生动地刻画了马福兴既滑稽又凶残的特征：

穿过彩绘的大门，一个矮小、头发花白、驴脸、胡须细长、目光凶狠的老头把我们迎进内院。此人盛装打扮，穿着比身材大好几号的蓝色中国陆军元帅服，头戴插羽毛的帽子，胸前挂有好几排星徽和勋章，肩膀上护膝那么大的金边肩章高高跷起。他那把瘦弱的老骨头架子金镶玉裹，象是稻草人套着大礼服，再穿上新疆军队中常见的那种无背带裤，十足是个中国式的帕弗拉戈尼亚海德佐夫伯爵。但在这出滑稽戏背后却隐隐透出杀机。因为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城堡坚固的大墙遮掩着的某个地方，不断有谋杀和严刑拷打之事发生。

正如斯克林所述，在老百姓看来，马福兴可一点儿也不滑稽，“他以杀身之祸，迫使人人都称他为‘帕迪沙’（伊朗语“国王”——译者），还把喀什最漂亮的突厥语穆斯林妇女收罗进自己的后宫。与此同时，他的仆役走遍乡村，按提台大人开玩笑的说法，去‘寻找新的奶牛’。”马福兴不满足于喀什贪官污吏常搞的“强取豪夺”、“收受贿赂”那一套，转而从事贸易和用原始方式开采南路的矿物资源。他宣布当地矿产均属军事当局所有，借开矿大发横财。他在阿克苏拥有油井，在喀什西约30英里的坎吉干有油井和铜矿，在叶尔羌河上游的墩城有玉石矿，还在南疆许多地方开办了煤矿。由于使用强制劳役，而且凭借武力垄断了生产和当地市场，他从这些事业中获取了大量利润。在地方手工业方面，他接管了一些地毯工场，还建立起玉石加工作坊。有材料说，他为此征集手工工匠，强迫他们“如奴隶般生活在手工作坊”。提台大人财源滚滚，为了供养他的东干士兵，每年还要从喀什金库提取大笔钱财。

不用说，这笔钱连十分之一也没有花掉。提台号称有4000到5000名士兵，可实际数目或许只有500名，其中大多还是未经训练、鸦片成瘾的倒霉蛋。他们没有军饷，没有口粮，没有装备，只凭着古旧的步枪（大多不能使用）和他们那个可怕的上司所造成的恐惧感而在乡间打食。

马福兴曾制造了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对于他的残暴有着许多记述，而且至少有一张受害者的照片保存至今。他有一架大铡刀，经常铡掉受害人的四肢，从手、足开始一个关节、一个关节地铡。马福兴当权时，白俄纳扎罗夫曾在喀什住过一些时

候，记下了这位提台如何折磨、残害、屠杀所有反对他或仅仅是当他喝酒时从面前走过的人。在喀什的4年间，纳扎罗夫经常看到“铡下的人手人脚成捆地钉在城门上，旁边还有告示说明这是谁的手脚，为何被铡。有时，那些砍断手脚的人也被同时绑在墙边。”马提台的一部分不义之财用来在离喀什约16英里的巴喀里克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宫院，而大部分聚敛来的黄金、宝石和其他钱财都上交给了乌鲁木齐的上司杨增新。

最后，马提台的行为变得实在过于残暴，以致一直担心发生革命或暗杀事件的杨增新决定最好还是除掉这个家伙。1923年秋季，提台采纳了一个主意，强迫喀什市民每月购买一定数量的粗石腊（是马福兴的坎吉干炼油厂几乎没有销路的副产品），干活要用石腊的皮匠更得买双份。皮匠行会的头头向提台表示不满，竟被活活打死，他的妻子也受到重罚，被迫卖掉了房舍，落得一贫如洗。显然，在马福兴的同僚看来，这个石腊事件（提台因此在南路的巴扎上被称为“无耻的石腊贩子”）简直不可容忍，于是一份报告被送到乌鲁木齐。杨增新意识到马福兴搜刮得太过分了，下令撤掉马福兴并取消提台一职。马福兴的对策是拒不承认被撤职，同时企图安抚其属下。他逮捕了自己的石腊经纪人，铡下其中四人的手足，还把他們分别弄到喀什的四个主要城门示众，身后的墙上钉着他们的四肢。

但这一次马福兴的运气已经到头。杨增新从乌鲁木齐下令给阿克苏道尹，此人派出马绍武统领的600名士兵。云南回族人马绍武早在1914年就由杨增新委任为库车驻军长官，现已升任乌什按办（清代官职，沿用至民国初年，系满语——译者）。他把主力派往巴楚以迷惑马福兴，自己带兵从北边悄悄地接近喀什。1924年5月31日，马绍武率一小队精选的士兵进入喀什汉城时，那位提台仍“象平常一样自负，以为敌人离喀什还有几天的路，连最起码的警戒都没安排”。当时，马福兴正在新近精心修建的喀什行宫（一个与巴喀里克宫院完全不同的建筑）里呼呼大睡，部队也毫无准备，许多人正抽着大烟。经过短促的小规模战斗，提台被活抓，仅仅胳膊受了点伤，他的部下也都投降。马绍武发电请示乌鲁木齐的杨增新，一份回电就此决定了马福兴的命运。第二天，马福兴在喀什汉城南门前被枪决，尸体绑在一个十字架上任由人民凌辱、亵渎。马绍武由于忠于杨增新，被提升为和田道尹。提台一职被取消，几乎完全没有参与此事的喀什道尹成了当地最高官员。1927年这位道尹死后，马绍武从和田调到喀什，从而取得在新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杨增新统治下的新疆经济

1911年以前，新疆一直从清朝国库获得大笔补贴（每年达二百万到三百万两白银）。清王朝覆灭，继起的中华民国政治上分崩离析，于是这种补贴也就随之终